

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 以馬華文學的台灣境遇為例

詹閔旭

國立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當代華語語系研究強調中華文化飄洋過海至異地，衍生出與中國文化大相逕庭的在地化面貌。儘管史書美的「後殖民抵抗論」和王德威的「後遺民傳承論」看似相左，兩人皆重視在地性（place-basedness），關懷中華文化與在地文化變貌之間的辯證張力。這篇文章試圖指出，我們不可小看「地方」的影響力，但倘若將華語語系文學視為單一地方的文化生產（one place-based production）恐怕流於簡化，忽略華語語系文學是多地共構的文學生產（places-based production）。這篇文章意欲以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學獎場域的境遇為例，勾勒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圖像，重新思考華語語系文學的特質。

關鍵詞：華語語系文學、馬華文學、在地性、弱勢跨國主義、文學獎、世界文學

Sinophone Literature
as Places-Based Production:
On the Predicament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

Zhan, Min-xu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Innov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Sinophone studies tend to conceptualize “Sinophone” in terms of the dialectics between the dominant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local variations in the Sinophone world. The importance of place-basedness is often underscored. Though seemingly opposed, both Shih Shu-mei’s call for “postcolonial resistance against diaspora” and Wang David’s theorization of “post-loyalism” treats “Sinophone” as a hybridized, heterogenous, and place-based production that is distinctive from the authentic Chinese cul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for the consideration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as multiple places-based production, and challenges the dominant discussions of (one) place-basedness. To illustrate the multiple places-based production in a transnational context, it examines

the recep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Taiwanese literary awards and poses timely inquiries into the definition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Key words: Sinophone literature,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place-basedness, minor transnationalism, literary award, world literature

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 以馬華文學的台灣境遇為例*

一、跨國作家的身分歸屬

2015年，台灣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和文訊雜誌社聯手打造「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邀集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等華語語系世界各地作家、評論者及專業人士參與票選，建構「2001-2015 華文長篇小說 20 部」。「小說引力」致力於挖掘在地優秀作品，體現華語語系文學眾聲喧嘩又交流頻頻的動力，堪稱二十一世紀初華文文學一大盛事。儘管此平台建置目的是為了挑選優秀華文作品，建立各地書單，以促進華語語系社群藝文資源交流，然而，一旦以票選方式進行，便隱含典律建構的難題：哪一部作品足以代表台灣華文長篇小說前 20 部？誰具有權力決定香港華文長篇小說由哪一部作品入列？華語語系地區的跨國交流反映何種現象？

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張貴興《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李永平《大河盡頭（上下卷）》分別入選台灣和馬來西亞的候選名單，最終卻雙雙落榜。李永平和張貴興之所以落榜，無關美學成就，而是出於國籍考量。王潤華是「小說引力」評選活動的跨國觀察員，他針對審查標準如此解釋道：「馬華的本土性

* 我要誠摯感謝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以及《台灣文學學報》編輯部的協助，讓論文得以更加完善。本文的一部分曾在 2015 年以〈作品的跨域：談馬華文學的跨域書寫〉為題，發表於廣州暨南大學舉辦的「跨域：馬華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另一部分論述以〈華語語系文學的小文學〉為題，發表於 2016 年文化研究協會舉辦的「跨界：再訪文化研究的方法與實踐」。感謝這兩場會議在場先進提供意見，包括張錦忠教授、黃錦樹教授、黃萬華教授、蔣淑貞教授、紀大偉教授、林肇豐博士等。

以及主體性是目下在地評選馬華文學的主流理論，這種作品才是真正『馬來西亞地區』代表性小說。」¹換言之，李永平、張貴興等人長期在台生活，他們的文化認同顯然不那麼的「文化馬來西亞」²。馬來西亞評審基於這兩位作家目前的國籍，將它們的作品從決審名單裡劃去；弔詭的是，台灣部分評審則考慮到這兩位作家出身馬來西亞，「以為你們（馬來西亞）會選」³，也不考慮圈選這兩位作家。雙邊評審各自禮讓，導致作家雙雙落榜。事實上，除了李永平和張貴興，李天葆的作品流露鴛鴦蝴蝶派風格，也遭評審質疑不夠在地⁴。此事件一方面帶出華語語系地區交流頻仍，作家跨國已成為常態；另一方面，作家一旦離境跨國，作家身分究竟該如何歸屬，儼然成為難題⁵。

作家離鄉跨國之後，是否影響作品內容嗎？當然會。作家生活在全新的環境、空間與社會文化氛圍，這些變動自然會影響——或滲透進——作家的創作，讓作品產生有別於以往的風味，誠如在台馬華小說家黃錦樹所言，即便他的小說鮮少以台灣為背景，他的寫作仍是不折不扣的台灣經驗⁶。換個方式問，作家如果沒有跨國經驗，作品表現是否就避免受到異國文化影響？當然不是。即便作家留在家鄉，作家至書店翻翻進口書，或上網瀏覽網頁，他國文學作品與文化仍可透過各種傳播管道直接、間接飄洋過海而來，進而影響在地作者的文學創作，例如西方現代主義經典對於全世界各地作家的影響即是顯著例證。

追根究底，問題的根源不在於作家是否移動，而是目前學界傾向以單一地方作為討論文學生產的標準。從這個角度，「小說引力」馬來西亞評審高舉在地

¹ 王潤華，〈黎紫書《告別的年代》、李憶若《遺夢之北》的觀察與思考〉，「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來源：http://novelncaf.wenhsun.com.tw/sel_my_review01.html，2016年9月14日）。

² 同註1。

³ 曾翊龍，〈馬華文學長篇小說：時空迷亂〉，「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http://novelncaf.wenhsun.com.tw/sel_my_review05.html，2016年9月14日）。

⁴ 同註1。

⁵ 這一、兩年關於跨國馬華作家的身分認定爭辯不休，可參考：魏月萍，〈「誰」在乎「文學公民權」？馬華文學政治身份的論述策略〉，《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18期（2015年9月），頁81-100；葉金輝，〈文學的國籍、有國籍馬華文學、與「入臺」（前）馬華作家：兼與黃錦樹和張錦忠商榷〉，《中外文學》45卷2期（2016年6月），頁159-190；黃錦樹，〈關於「真正的馬華文學」——回應葉金輝的商榷（修訂稿）〉，《季風帶》第2期（2016年11月），頁78-82。

⁶ 黎紫書訪問、黃錦樹對談，〈寫在家國之外：下〉，《星洲日報》文藝春秋，（來源：<http://life.sinchew.com.my/node/12843?tid=63>，2016年9月14日）。

性並非特例，這樣的呼聲隱然呼應當代文化論述。近十多年來，不少研究關心在地化驅動力（localization），將之視為一股迎擊全球同質化力量的抵抗空間。地方、在地性、全球在地化等概念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這幾年備受關注的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同樣對於在地性（place-basedness）念茲在茲，亦屬於同一套論述取徑邏輯。

當然，地方不可能斷絕與外界的關係。我在與徐國明合寫的論文〈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關於臺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⁷業已指出，台灣是多種華語語系文學交會之地，展現地方的跨國文化流動軌跡。該篇論文舉原住民華語文學和馬華文學為例，說明台灣對於不同的華語語系文學採取截然不同的認可判準。本篇論文則試圖延伸論點，進一步論述以單一地方為批評判斷基準的操作，將難以回應越來越多的文學作品其實是多地文化共構的產物。這一點在華語語系文學場域尤為顯著。全球華語語系社群大多屬於規模小的移民社群，文學市場整合、資源匯流已屬常態：馬來西亞作家赴台留學定居（李永平、張貴興）、台灣作家移居歐美（陳玉慧、施叔青）、香港、新加坡作家選擇在台灣出版（西西、董啟章、英培安），乃至於寫作系譜的跨國賡續（張愛玲之於李天葆，魯迅之於陳映真），均可見一斑。華語語系的跨國現象——無論是作家的跨國移動，或作品的跨國傳播接受——讓作家的文學成就與作品分析必須放在兩個以上的脈絡，加以細細剖析。簡單來說，跳脫單一地方為框架的文學想像，進而思考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便是這篇文章的主要呼籲。

這篇文章將透過馬華文學的台灣境遇為個案，勾勒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圖像。本文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我將整理近年來華語語系研究的發展、重要論者及其主張，思考華語語系文學的特質。華語語系研究這幾年備受重視，尤其以史書美的「後殖民抵抗論」和王德威的「後遺民傳承論」奠定基石。值得注意的是，史書美和王德威的論述看似相左，兩人皆重視中華文化與其在地演繹的辯證關係，圍繞在地性（place-basedness）鋪展其論述格局。我認為這種將華語語系文學定調為（單一）在地生產（one place-based production）的取

⁷ 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關於臺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44卷1期（2015年3月），頁25-62。

徑，難以照應到華語語系文學實際上是多地共構的產物（multiple places-based production）。

第二部分將剖析馬華作家在台灣《中國時報》、《聯合報》兩大報文學獎的得獎作品，具體說明華語語系文學何以是多地共構的產物。自七〇年代後期以降，台灣各大文學獎是馬華作家進入文壇的重要管道，包括李永平、張貴興、陳大為、鍾怡雯、黃錦樹、黎紫書皆在台灣各大文學獎獲獎連連，進而受到矚目。本文將挑選鍾怡雯、辛金順、黎紫書在兩大報文學獎的得獎作品為分析對象。這三人除了均是台灣文學獎常勝軍以外，他們更分別代表三種文類：鍾怡雯的散文、辛金順的詩、黎紫書的小說；也代表三種位置：在台定居的鍾怡雯、曾在台灣留學工作後返馬的辛金順、不曾赴台留學工作的黎紫書。這篇文章希冀透過三種文類、三種位置，闡述台灣文學獎如何介入、影響、複雜化馬華文學作品的意義生成，具體說明多地共構的運作。

二、華語語系研究的在地性（place-basedness）

華語語系研究約莫是自 2006、2007 年左右年開始受到廣泛矚目的新興研究領域，這股研究趨勢以美國學界為基地，向馬來西亞、香港、新加坡等地推展，同時也吹向台灣。早年陳鵬翔、張錯曾經提倡類似概念⁸，史書美、王德威則是當代推廣華語語系研究最力的兩位學者，奠定華語語系理論化基礎，也讓北美學界成為孕育華語語系研究的根據地。

何謂華語語系？為何提倡華語語系？在英文的用法裡，「Chinese literature」指的是「中國人的文學」（literature of Chinese citizens），也同時可以是「華文文學」（literature in Chinese language），不免讓人混淆。為此，學者參照法語語系（Francophone）、英語語系（Anglophone）的用法，建構「華語語系」一詞，提醒人們留意中國境內非漢人以及中國境外同樣使用華語的文學／文化生產。儘管不同學者對華語語系研究的定義、範圍、歷史進程的描述莫衷一是，

⁸ 張錦忠，〈華語語系文學：一個學科話語的播散與接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61-65。翁弦尉，〈杜撰 Sinophone 的第一人：陳鵬翔教授回想「華語風」〉，《蕉風》第 507 期（2014 年 3 月），頁 39-41。

華語語系研究學者的共同主張可從蔡建鑫和高嘉謙這段言簡意賅的話來理解：「試圖打破舊有的、漢人中心（Han-centric）與中國中心（China-centric）的典範，並以比較的理論觀點，重新啟動不同文化、不同族群、與不同宗主國之間的對話。」⁹

華語語系研究以全球使用華語的社群為研究對象，既是理論性「指涉框架」（frame of reference），更闡拓各式各樣嶄新的「提問模式」（mode of inquiry）¹⁰。舉例來說，石靜遠（Jing Tsu）思考華語語系隱含的語言、聲音及華語圈語言治理的議題，姜學豪（Howard Chiang）從跨性別研究、酷兒理論的角度切入華語語系研究的性別面向，陳綾琪（Letty Chen）挪用記憶政治重估離散的力量，皆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述¹¹。不過，在華語語系相關研究裡，仍以史書美的後殖民弱勢抵抗論述和王德威的後遺民傳承論最值得注意，引發後續熱烈討論，成為目前華語語系研究的代表性論述。

史書美的華語語系理論論點源自《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2007）一書，此書融合翻譯理論、跨國主義、後殖民論述等不同理論基礎，勾勒華語語系地區的華人如何告別離散、告別中華性，逐漸開展建構在地新認同的路徑。根據史書美的定義，華語語系包含「中國以外，或是在中國與中國性邊緣的各個不同地方形塑出的文化生產」¹²。在她的理論架構，華語語系是一個相對於中國的概念，主張華人一旦從中國移居到不同華人地區，在不同社會脈絡生根發芽，隨著時間推移，中華文化與中國人的文化認同必然日趨異質化、在地化，因而發展出獨特的「在地」（place-based）文化實踐與生活經驗，進而告別中國。史書美特別強調「中國以外」（outside China），引發不少爭議。儘管史書

⁹ 蔡建鑫、高嘉謙，〈多面向的華語語系文學觀察：「關於華語語系文學與文化」專輯〉，《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2012年12月），頁2。

¹⁰ 同註9，頁3。

¹¹ Tsu, Jing,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Howard Chiang ed., *Transgender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Howard Chiang and Larissa Heinrich eds., *Queer Sinophone Cultur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3). Lingchei Letty Chen, "When does 'Diaspora' End and 'Sinophone' Begin?" *Postcolonial Studies* (2015), DOI: 10.1080/13688790.2015.1050975.

¹² 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4.

美解釋此舉並非刻意排除中國，如此做是為了讓弱勢、邊緣、被殖民的聲音得以浮現¹³，但這樣的說法仍遭人批評是「偏頗的意識型態」(ideological bent)¹⁴。

事實上，中國學者十多年前提出的海外華人文學、世界華人文學皆將中國排除在外¹⁵，何以史書美排除中國的主張掀起如此軒然大波？關鍵在於，史書美版本隱含了「中國 vs. 華語語系」等於「殖民 vs. 被殖民」的意識型態。史書美挪用後殖民主義與批判種族主義支撐華語語系論點，勾勒華語語系的三種歷史過程：(1)「大陸型殖民主義」(continental colonialism) 關切中國自十八世紀以來對周邊地區進行的掠奪壓迫；(2)「定居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 關心華人為多數的華語語系地區，施加於當地原住民以及新移民的宰制；(3)「移民／遷移」(im)migration) 則主要關注華人移民社群在新居地屬於弱勢族群者，如何回應新居地種族政治¹⁶。這三種歷史過程從種族關係重新勾勒權力、政治與知識生產的合謀，跳脫以往離散華人研究所念茲在茲的文化原鄉和中華性。

史書美從後殖民角度發展華語語系方法學，無疑闢拓嶄新論述空間，卻也招致批評。王德威和李有成指出法語語系、英語語系或西班牙語語系等概念緊貼著西方殖民主義的版圖擴張，但華語語系文學卻是華人離散經驗的產物，不可一概而論¹⁷。盧曉鵬、趙稀方、廖炳惠也提醒我們，華語語系文學確實充滿後殖民色彩且大幅度影響了其表現，以後殖民為方法並無不妥，可是全球華人社群所面臨的殖民主義結構並非來自中國，例如馬來西亞、香港所面對的殖民母國應為英國，台灣則面對日本殖民主義¹⁸。

¹³ Shih, Shu-mei, "Forwards: The Sinophone as History and the Sinophone as Theory,"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vol.6, no.1 (2012), p. 5.

¹⁴ Lu, Sheldon, "Genealogies of Four Critical Paradigms in Chinese-Language Film Studies," in Audrey Yue and Olivia Khoo eds., *Sinophone Cinemas* (New York: Palgrave, 2014), p. 21.

¹⁵ Tee, Kim-tong "(Re)mapping Sinophone Literature," in Jing Tsu & David Der-wei Wang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Boston: Brill, 2010), pp.77-91.

¹⁶ Shih, Shu-mei, "Introduction: What is Sinophone Studies?" in Shu-mei Shih, Chien-hsin Tsai, &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14.

¹⁷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台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25。李有成，〈緒論：離散與家國想像〉，收於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晨文化，2010 年），頁 8-9。

¹⁸ 同註 14，頁 22。Liao, Ping-hui, "Sinophone Literature," in Yingjin Zhang ed.,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6), p. 145。趙稀方，〈從後殖民理論到華語語系文學〉，《北方論壇》第 250 期（2015 年 4 月），頁 33。

有別於史書美，華語語系研究另一大將王德威提倡以「後遺民」取代「後殖民」為方法，可大大開闊華語語系的論述格局。首先，王德威認為，史書美側重華人落地生根的面向，這樣的談法並無法全面解釋華語語系社群的認同軌跡，而必須將華語語系研究擴及全球華人的「三民主義」——包含「離散漂泊的移民」、「落地生根的夷民」以及「拒絕融入新居地文化的遺民」——，方能豐富我們對華語語系文學的想像¹⁹，史書美的談法顯然只顧及「落地生根的夷民」，有所不足。其次，除了「移民」、「夷民」、「遺民」文學，王德威也提出「後遺民」的觀點作為其華語語系研究的理論基礎。他論道：

如果遺民意識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後遺民則可能變本加厲，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更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推而廣之，我也以為後遺民心態瀰漫在華語語系的世界裡，成為海外華人持續（已經失去的，從未存在的）「正統」的中國最大動力。²⁰

王德威所謂的「後遺民」意指海外華人飄洋過海來到異土，仍將傳承中華文化視為己任。只不過，後遺民之所以異於傳統遺民意識，在於後遺民意識到傳承正統的不可信、不可能、不可得，卻偏偏要傳承那不可傳承的傳統。由此觀之，後遺民傳承觀一方面彰顯傳承本身的弔詭邏輯，另一方面展現海外華人遺民對正統中華文化的批判自省。

王德威對於傳承、正統、中華性念茲在茲，反映在他批評史書美版本的華語語系地圖將中國排除在外。華語語系文學對他而言，是以華語為最大公約數，打造廣義中國與中國境外文學的辯論平台。王德威指出，史書美刻意排除中國，無疑回返國族主義，將文學依附於政治所界定的地理範疇的舉動。華語語系研究一旦排除中國，便暗示論者仍緊抱著國家地理疆界的概念不放，不免窄化了文學潛藏的虛構與顛覆動能。王德威的質疑是：「文學地理是否永遠必須依附在政治的或歷史的地理的麾下，形成對等或對應的關係？」²¹

¹⁹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台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22期（2012年12月），頁26-27。

²⁰ 同註19，頁27。

²¹ 同註19，頁14。

必須特別強調的是，王德威自然清楚意識到中華文化或政治中國的龐大巨影，這也是王德威和中國學者所倡導的世界華文文學、海外華文文學、漢語新文學等論述最核心的差異。他批評中國學者所建構的華文文學版圖流露強烈的華人大團圓的和諧願景，「有意無意忽略了同文同種的範疇內，主與從、內與外的分野從來存在，更何況在國家主義的大纛下，同聲一氣的願景每每遮蔽了歷史經驗中斷裂游移、眾聲喧嘩的事實」²²。從王德威的角度來看，無論是刻意將中國排除或擁抱入懷，皆過猶不及，他主張把中國「包括在外」，從勢的詩學開展依違於審美和政治之間的華語語系，「華語語系文學研究不是差異的輕易確立或抹除，而是識別間距，發現機遇，觀察消長」²³。

我以上簡單回顧華語語系研究學者的核心論點，有意思的是，儘管史書美和王德威的論點有所交鋒對立，在地性於他們的論述架構裡皆扮演關鍵角色。對史書美而言，在地實踐（place-based practices）標榜異質、混雜、多元、多語等特質，正好說明離散華人拒絕離散，拒絕回歸文化原鄉的姿態。從王德威的角度來看，中華性飄洋過海之後受到在地風土影響而衍生出複雜文學及文化樣態，一方面說明華語圈眾聲喧嘩、多姿多采的文化面貌，另一方面，這不也開啟離散華人對傳承中華性的批判性思索與承擔。

史、王二人的「在地性」仍是以（相對於中國的）單一地方為主，而我以為突顯單一在地性（one place-basedness）的定義方式恐怕難以開展華語語系理論的格局，反而將華語語系理論局限在中華性 vs. 在地性的二元對立框架。正如德里克（Arif Dirlik）犀利地指出，儘管在地實踐可有效抗拒文化同質化的霸權結構，他卻質疑，如此高舉「華語語系」所建構的新空間想像——以單一在地性連結所形成的跨國華語語系想像——是否抹滅或邊緣化了這些地方彼此之間的差異、拮抗、摩擦²⁴？換言之，除了中國 vs. 香港、中國 vs. 新加坡、中國 vs. 台灣等二元框架，我們如何想像華語語系不同地方之間的跨國連結，例如香港

²² 王德威，〈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第24期（2013年12月），頁7。

²³ 同註22，頁16。

²⁴ Dirlik, Arif, "Literary Identity/Cultural Identity: Being Chines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MCLC Resource Center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s://u.osu.edu/mclc/book-reviews/literary-identity/>, September 19, 2016).

與台灣之間的關係為何？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之間又是如何？王亦蠻（Yiman Wang）呼籲，多向度而又繁複的世界化（worlding）策略有助於抵抗僵硬的地域想像，同時也避免中心 vs. 邊緣的窠臼²⁵。

華語語系的跨國連結反映華語語系文學發展的現實難題。華語語系社群和英語語系、法語語系國家大不相同，後兩者是殖民的產物，指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多數新興獨立國家。相較之下，全球華語語系社群（如果姑且將中國包括在外）一方面由移民社群所組成，異質的「華語語系聲音」往往面臨是否該融入在地的考驗，另一方面即使是華人占據多數的定居者殖民如台灣、新加坡，總人口和市場規模也偏小（更何況新加坡的主導語言是英語，而非華語）。換言之，全球華語語系社群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各地說華語、讀華語的規模太小，再加上文學閱讀人口逐漸萎縮，在此前提之下，全球華語出版市場的整合勢在必行，而擴大市場的策略之一，便是匯流整合成全球華文閱讀市場，因而讓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成為可能。

在後殖民與後遺民兩個典範之外，我認為從關係性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來探索華語語系文學的內涵，可闡拓極具潛力的論述空間。陳榮強曾引述 Jacques Derrida 的觀點，指出「華語語系發聲」（Sinophone articulation）的「articulation」一詞除了具有「發聲」的意義，強調遭到消音的弱勢與邊緣向主流發聲喊話之必要以外，「articulation」也隱含「連結」之意，可用來指涉兩種不同的文化如何在特定情況下產生連結。此連結並非穩定、永恆、絕對的接合，而是一種策略性的政治性結盟：華語語系地區的在地化經驗有所交流、切磋、相互借鑑，可作為各自反思中華文化的參照範本，展現出以華語語系為連結的弱勢跨國主義²⁶。從中文的意思來想，張錦忠也提醒我們，「華語語系的『系』，除了語系以外，也是複系統的『系』，值得深入檢視各種文學複系統之間的『系際關係』」²⁷，再次呼應「關係性思考」的必要性²⁸。

²⁵ Wang, Yiman, "Alter-Centring Sinophone Cinema" in Audrey Yue and Olivia Khoo eds., *Sinophone Cinemas* (New York: Palgrave, 2014), p. 28.

²⁶ 陳榮強，〈華語語系研究：海外華人與離散華人研究之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87。

²⁷ 張錦忠，〈哇賽，那風萬里捲潮來：「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專號前言〉，《中山人文學報》第 35 期（2013 年 7 月），頁 viii。

²⁸ 關係性思考是饒富深意的課題，可惜目前相關討論仍嫌不足。不足的理由和華語語系領

接下來，我想透過馬華文學的具體個案分析，論證華語語系文學不只是單一地方所生成的文學，更是多地共構交織而成的文學。近年來，不少投注於華語語系研究的學者留意到東南亞華文文學，其中以新馬的華語語系文學生產最受青睞。全球華人文學研究以中國文學為大宗，少數觸及台灣文學，然而華語語系大大開展研究者的觀看視野，往東南亞挺進。除了史書美、王德威、石靜遠的專書或期刊論文觸及東南亞華文學創作以外，不少新世代學者在近兩三年也陸續將博士論文改寫為專書，不約而同選擇析論東南亞華文文學，諸如高嘉謙的《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E.K. Tan 的《重思中華性：南洋文學世界的跨國華語語系認同》（*Rethinking Chineseness: Transn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Alison Groppe 的《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非中國製作》（*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Brian Bernard's 的《書寫南方海域：中國與東南亞後殖民文學的南洋想像》（*Writing the South Seas: Imagining the Nanyang i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s Postcolonial Literature*）²⁹，接力為東南亞華語語系文學生產的深度研究打下基礎。

王德威注意到此現象，他認為此趨勢有助於調整東南亞華文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他在〈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這篇論文以馬華文學為例，提到馬華文學研究正陷入國族主義，進退維谷，此壓力一方面是馬華文學反思是否該繼承中國文學傳統（斷奶論），另一方面是用華文寫作的馬華文學不被馬來西亞國家文學認可（只認可馬來文創作）的焦慮。於此之際，華語語系

域現今的發展及未來限制大有關係。華語語系研究發展多年仍無法擺脫以大國為參照對象的宿命，不管是處理中華性從中國移植到異地的文化變貌（如香港與中國），亦或是華語語系地區和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糾葛（如馬來西亞與英國）。換言之，倘若要捨棄大國為參照座標，發展兩個華語語系地區之間的橫向連結，在西方學界恐怕會遭遇到許多現實的課題，最核心的關鍵是，誰會對（比方說）香港和馬華之間的連結感興趣？朱崇科批評華語語系研究如果排除中國，不免淪為封閉的學術領域，他的說法背後儘管隱藏以中國為核心的意識型態，這樣的說法也未必無的放矢：朱崇科，〈再論華語語系（文學）話語〉，《揚子江評論》第1期（2014年6月），頁17-18。

²⁹ Tan, E.K., *Rethinking Chineseness: Transn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13). Groppe, Alison,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13). Bernard's, Brian, *Writing the South Seas: Imagining the Nanyang i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s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所闢拓出來的異托邦想像，正好標榜一種抗拒國族主義的姿態，提供重新定位馬華文學的介面³⁰。王德威從華語語系文學和世界文學的維度重新定位馬華文學，他強調當馬華文學與華語語系論述接軌之際，可望闢拓出截然不同的世界觀，這即是謝永平(Pheng Cheah)所謂的「創造世界的行動實踐」(world-making activity)，讓我們得以從創造世界的實踐裡，嘗試想像另一個未知而即將到來的世界³¹。然而，馬華文學如何落實創造世界的行動？馬華文學如何與其他華語語系地區產生構連、對話，進而影響馬華文學作品的意義生成？我將以鍾怡雯、辛金順、黎紫書在兩大報文學獎的得獎作品為分析對象，希冀能透過三種文類、三種位置，勾勒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文學及其背後潛藏的課題。

三、三個馬華文學個案

我想從鍾怡雯榮獲 1997 年時報文學獎散文首獎的〈垂釣睡眠〉談起。這篇散文不但深受評審喜愛，更被選入高中國文教科書，難能可貴，日後與其他作品一同集結成冊出版，同樣受到市場好評。〈垂釣睡眠〉無疑是觀察台灣與馬華文學互動的指標性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垂釣睡眠〉堪稱是最廣為台灣人熟悉的馬華文學作品，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作者的馬來西亞背景，這和這篇文章所選擇的主題和書寫策略有關。〈垂釣睡眠〉如同題目所述，描寫失眠這個現代文明病。

睡眠成了生活的主題，無時無刻都糾纏著我，因為失去它，日子像塌陷的蛋糕疲弱無力。此刻我是獵犬，而睡眠是兔子，牠不知去向，我則四處搜尋牠的氣味和蹤跡，於是不免草木皆兵，聲色俱凝。眾人皆睡我獨醒本就是痛苦，更何況睡意都已悉數凝聚在前額，它沈重得讓我的脖子無法負荷。當然那睡意極可能是假象，儘管如此，我仍乖乖的躺回床上。模糊中感到鈍重的意識不斷壓在身上，甜美的春夜吻遍我每一寸肌

³⁰ 王德威，〈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中山人文學報》第 38 期（2015 年 1 月），頁 17。

³¹ Cheah, Pheng, "What Is a World? On World Literature as World-Making Activity," *Daedalus*, vol. 137, no. 3 (2008), p. 26.

膚，然而我不肯定那是不是「睡覺」，因為心裡明白身心處在昏迷狀態，但同時又聽到隱隱的穿巷風聲遊走，不知是心動還是風動，或是兩者皆非，只是被睡眠製造的假象矇騙了。³²

這篇散文以「失眠」為題，展開一連串圍繞睡眠的比喻，一下子是塌陷的蛋糕，一下子是獵人與兔子之間的競逐，一下是壓得敘事者喘不過氣的負荷，一下又是輕輕穿巷而過的風。失眠讓敘事者感官全開，「遠處細微的貓叫，在聽覺裡放大成高分貝的廝殺」³³，倒讓這篇散文得傾盡心力渲染感官細膩處與作家敏銳的觀察力。〈垂釣睡眠〉篇幅簡短精鍊，以樸質的語言承載豐富多變的意象，讓人讀來不禁感同身受。

〈垂釣睡眠〉在該屆評審會議備受讚譽，評審陳萬益提到：「〈垂釣睡眠〉的作品也是在面對失眠的共同經驗時，從不堪其擾的制式反應中，換隻眼去審視，而得來異樣新鮮的情趣。」³⁴陳萬益特別指出失眠的共同經驗，可說相當精準。這篇散文之所以能取得共鳴，關鍵在於它的主題深具普世性，這篇散文缺乏明確的地理空間指涉，它可能發生在任何地方的大都市或小市鎮，我們在匿名的文學獎審查平台，光憑作品恐怕難以得知這篇作品的作者是一位馬來西亞華人，也無從得知它的跨國色彩。

鍾怡雯廣受台灣文學獎肯定的作品如〈垂釣睡眠〉、〈給時間的戰帖〉皆不容易察覺馬來西亞地方色彩。吳麗絲（Lai-Sze Ng）和陳志銳（Chee-Lay Tan）的研究指出，鍾怡雯早期作品如〈可能的地圖〉、〈一同走過〉、〈島嶼紀事〉時常選擇馬來西亞歷史和地景為寫作場景，描寫華人、馬來人與印度人的跨族群互動，南洋色彩鮮明而強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品只在馬來西亞贏得獎項，並不受台灣文學獎青睞。鍾怡雯一直到〈垂釣睡眠〉、〈給時間的戰帖〉這些作品，方才擲獲台灣文學獎評審目光，而這些作品抹去作品裡的南洋在地風情，反倒是以充滿高度美學實驗的修辭技術和意象使用取勝³⁵。

³² 鍾怡雯，〈垂釣睡眠〉，《中國時報》，1997年10月7日，第27版。

³³ 同註32。

³⁴ 陳萬益，〈換隻眼看失眠：簡評〈垂釣睡眠〉〉，《中國時報》，1997年10月7日，第27版。

³⁵ Ng, Lai-Sze and Chee-Lay Tan, "A Study of the Prose of Choong Yee Voon (Zhong Yiwen): A Case of a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in Taiwan," *Tamkang Review*, vol.46, no.1 (2015), pp. 79-83.

鍾怡雯寫作特色的轉變恐怕不單純是作家寫作關懷的轉變，而涉及台灣文學獎地緣政治的運作。我之前和徐國明合寫的論文，嘗試比較台灣文學獎場域裡的台灣原住民作家瓦歷斯·諾幹與馬華作家陳大為作品，我們當時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台灣原住民作家往往標榜族裔身分，期望透過寫作真實性的創作，積極為原住民的弱勢處境發聲；相較之下，馬華作家則以風格化作品鍛鍊寫作技藝，在作品裡刻意淡化其族裔身份、地方色彩，並期許能藉由突顯其美學表現成為受認可的華文作家³⁶。陳大為之所以採取這樣的策略，與馬來西亞相對於台灣的地緣政治位置有關。由於台灣讀者／評審對馬華歷史背景的陌生，倘若作品裡突顯馬華符號，並不能讓讀者產生共鳴，反倒會造成理解上的阻礙。同樣的，鍾怡雯從早期的南洋色彩寫作，轉向強調修辭美學與意象的經營，從而憑此類作品獲得台灣文學獎肯定，這樣的變化歷程也再次驗證外部地緣政治如何影響作家的寫作。

耐人尋味的是，鍾怡雯在台灣獲獎作品雖淡化地方感，反而辯證性地帶出「地方」在她作品的重要性，彰顯跨國寫作所必須面對的課題。如上所述，目前討論華語語系文學作品時，地域特殊性通常是論者關注焦點。鍾怡雯在台灣文學獎獲獎的作品卻挑戰這樣的觀點，降低她早期作品裡的顯著南洋風味。儘管鍾怡雯在〈垂釣睡眠〉、〈給時間的戰帖〉這類作品並不刻意突顯馬來西亞在地性，我仍想指出，這種淡化地方特殊性的表現形式仍舊與「地方」息息相關，因為這一方面標示作家跨地方移動的創作軌跡與創作心態的調整，另一方面也呼應台灣和馬來西亞之間的地緣政治。這裡的「地方」不再是指單一的土地，而是兩塊土地之間跨國共振導致文學作品書寫與創作衍生出有別於以往的樣貌。

我第二個分析的個案是辛金順的詩作〈注音〉。辛金順是馬來西亞華人作家，九〇年代赴台灣留學，在台灣生活十餘年，後遷居回馬來西亞，此後在台灣與馬來西亞雙鄉之間頻繁穿梭。辛金順在 2006 年憑藉〈注音〉勇奪時報文學獎新詩首獎，這篇作品和前述鍾怡雯講究意象營造和普世性主題的作品不同，

³⁶ 除了陳大為之外，有不少馬華作家在台灣兩大報的得獎作品均可窺見淡化地方色彩的處理，可參考註 7，頁 54-55。必須特別強調的是，部分並不等於全部，這篇論文所討論的黎紫書和黃錦樹均曾以充滿異質性的馬共小說，奪得台灣文學獎。

〈注音〉這首詩以台灣獨特的注音符號標音法為切入點，從深具台灣味的題目到內容，反映鮮明的地方特色。

我試圖走入你的唇音，大聲的說：這是ㄅ，那是
ㄇ，搖醒的ㄉㄌㄎ跟在童年身後，說出
你是我，坐下、遊戲、洗澡睡覺和
愛，和我們在聲音裏互相交錯而過的遺忘³⁷

這首詩以「我試圖走入你的唇音」揭開全詩詩行，並學習你的唇音，大聲說出「這是ㄅ，那是ㄇ」。顯然，這首詩裡的「你」意指台灣獨特的注音符號標記法。放在台灣文學獎平台，這首詩的敘述者很容易想當然爾假定為台灣人。然而，隨著這首詩繼續開展，「我」的身分逐漸複雜：

我照見自己如一條河流向迷離的前方
蜿蜒遠去，並從死亡，不斷讀出自己不斷
穿過拼音的詞彙和記憶的盆地，向遠方逃亡

這是一生的逃亡啊！一生，都在別人的語言裏
因此ㄨㄛˊ是我嗎？或是 W03，國語和
普通話，在牙齒與牙齒彼此撞擊的震顫
之間，我會從你的身影中走出來嗎？
赤裸走出，說自己要說的話³⁸

這幾句詩行出現了另一種發音標記——拼音，而且詩作描寫敘述者在「國語」和「普通話」，在「注音」和「拼音」兩種系統之間擺盪。詩裡的敘述者在兩種語言裡移動，暗示移動的身世。換言之，儘管標題「注音」充滿台灣味，這卻是一首關於馬來西亞華人的隱喻。李有成對照作者辛金順馬來西亞赴台灣留學的背景，認為「這首詩的說話人夾在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還有繁體字與

³⁷ 辛金順，〈注音〉，《中國時報》，2006年11月27日，第E7版。

³⁸ 同註37。

簡體字——之間，感嘆自己的『一生，都在別人的語言裡』，找不到自己的身分」³⁹。林建國更直指這一首詩隱喻馬華文學夾在中文大國的邊緣處境，主張：「〈注音〉一詩寫的正是這種「去華文」的痛楚，以及「再中文」的非踏實感…是我們在他們裡寄人籬下的孤寂。」⁴⁰

〈注音〉這首詩緊緊貼合作者本人的生命經驗，語言、遷徙、以及跨地方移動所帶來的認同難題成為這首詩的主題。辛金順的〈注音〉顯然採取了和鍾怡雯〈垂釣睡眠〉截然不同的書寫策略，他不走普世性主題，而是透過文學創作傳達出跨國移動所遭遇的自身身分認同難題。辛金順曾在一本書的自序提到：

那些年，我躲在島上的某間大學裡，放縱自己不斷在思想上遷徙的歲月，或隱匿於繁體中文的書寫中，想像著文字背後的象徵…寒暑假時我回到半島上，中文的書寫在鍵盤上退回到拼音符號的世界，「故我」也被召喚出來…故鄉與他鄉，亦在拼音與注音符號的轉換中，成為彼此互相錯置的夢境。⁴¹

注音和拼音不再只是兩種發音標記法，更進一步各自指涉辛金順在台灣與馬來西亞之間的雙鄉移動。這首詩以「我試圖走入你的唇音」傳達出跨國移動的艱難處境：一方面，「說出／你是我」、「我們在聲音裏互相交錯而過的遺忘」帶出敘事者「我」不得不放下舊身分，從而走入新身分、腔調、唇音的艱難歷程；另一方面「我會從你的身影中走出來嗎？／赤裸走出，說自己要說的話」則又流露出對追尋自我定位和認同的必要。

我以上的閱讀毋寧是後見之明，都是在知道作者生平之後進行的解讀。而在匿名的文學獎平台，這篇作品的命運和解讀脈絡又是如何呢？有意思的是，因為辛金順〈注音〉詩裡沒有明確標舉「馬來西亞」，只以注音和拼音兩套標音

³⁹ 李有成，〈傷悼——辛金順詩集《注音》序〉，收於辛金順著，《注音——辛金順詩集》（台北：釀出版，2013年），頁8。

⁴⁰ 林建國，〈理想詩人之路_2〉，《南洋商報》副刊，（來源：http://www.enanyang.my/news/20160830/%E7%90%86%E6%83%B3%E8%AF%97%E4%BA%BA%E4%B9%8B%E8%B7%AF_2%E6%9E%97%E5%BB%BA%E5%9B%BD/，2016年8月30日）。

⁴¹ 辛金順，〈在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之間〉，（來源：<http://blog.yam.com/sen/article/45036821>，2016年9月14日）。

系統幽微地指涉作家的複雜身世，倘若不知道作者是誰，不知道作者的身世背景，恐怕難以在匿名投稿的文學獎平台讀出在跨國移動的意涵。在該屆評審會議裡，評審之一的吳晟顯然不是如此理解這一篇作品，他在評審感言寫下如此對這首詩的評析：

人們日常使用的語言，往往不只是作為表情達意的「工具」，而是承載著族群（或國族）認同…尤其在統治權多次更替、「國家語言」也多次轉換的特殊背景下，台灣土地上生活的人們，這些附加「意義」更為明顯，每一世代的語言學習，必然要經歷不斷衝突、調適的過程。「注音」這首詩就是處理這樣的題材，將個人學習語言與整體時代共同經驗有機地連結。⁴²

對我來說，辛金順這首〈注音〉透過語言為切入點，展現馬來西亞華人在不同華語語系社群的移動經驗；有別於此，吳晟詮釋這首詩時，則彷彿把作家假定為台灣人，並從國家治理角度切入，將注音符號視為國家語言與國家機器教育人民、型塑國家認同的幫兇。吳晟把〈注音〉這首詩放在台灣國語推行運動脈絡，把注音視為離開母語、進入國語的管道——「這是一生的逃亡啊！一生，都在別人的語言裏」。「在別人的語言裡」指涉的是台灣人在戰後國民黨教育下，忘卻母語，只會說國語。如果說我的讀法是從跨國角度理解這篇作品，吳晟的讀法則是放在台灣歷史脈絡，放在官方語言與方言母語之間的角力，召喚在國家機器旗幟下遭到壓抑的鄉土庶民文化，強調官方語言（國語、注音）在國家機器運作過程裡扮演凝聚全體國民的國家認同與向心力的角色。吳晟是台灣鄉土文學與母語文學的健將，具有鮮明的本土意識，他對於〈注音〉一詩的「在地讀法」（place-based reading）並不讓人意外。

如果說吳晟把這首詩放在台灣歷史語境的讀法是一種「在地讀法」，我的則屬於另一種「在地讀法」，我在此並列這兩種讀法，無意標舉何種讀法較為適當，我亦非指責吳晟誤讀了〈注音〉，問題恐怕更加複雜，至少涉及兩個層次的課題。

⁴² 吳晟，〈評審意見：語言糾葛〉，《中國時報》，2006年11月27日，第E7版。

首先，〈注音〉在文學獎平台耐人尋味的詮釋落差彰顯出馬華文學作品所蘊含的異質性如何在跨域過程產生質變、翻譯。從後見之明來看，辛金順的〈注音〉無疑是一篇跨國作品；然而，在不辨作者出生地的匿名審查平台，作品展現「多層次在地閱讀」(places-based reading)的潛力。一種是從充滿異質跨域移動與認同追尋的讀法，另一種是從官方文化打壓在地方言的讀法，〈注音〉巧妙地串連起這兩種詮釋意義，提醒我們注意同一作品在不同華語語系社群的可翻譯性，銘刻出從一種在地讀法到另一種在地讀法的可能。

其次，這兩種在地讀法(two kinds of place-based reading)提醒我們留意「多層次在地讀法」的必要性，而我認為這正是華語語系文學的一大特色。當全球華文文學場域浮現，隨即提醒我們意識到在地讀法的局限。在地讀法強調任何文化一旦邁向異地，將產生在地變貌、在地實踐，因此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需以在地為脈絡，細膩地剖析文學作品的內涵。然而，如上所述，既然當代華文文學作品已然是跨國市場產物，跨國化已是它的宿命，那麼只偏好某一種在地閱讀的讀法，恐怕無法對應文本在跨國場域衍生出的繁複意義生產過程。比方說，以〈注音〉為例，如果只將馬來西亞華人的跨國身世視以為真，而認為（吳晟提出的）台灣母語運動復振的讀法只是一種誤讀，恐怕會忽略了〈注音〉這首作品在評審會議大放異彩和當時台灣如火如荼的本土化運動息息相關，也抹煞掉〈注音〉這首作品介入台灣在地脈絡的可能切入點。簡言之，華語語系文學是一種多層次在地讀法，多層次閱讀讓華語語系文學的跨國性成為可能。

統整本節從一開始到現在的討論，我們似乎發現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學的可能性漸漸開闊。馬華文學要怎麼寫？如何寫才能受到台灣文學獎青睞？除了採用鍾怡雯早期作品的普世性路線以外，另一種可能是多層次在地寫作，這種寫作策略儘管不排斥馬來西亞在地元素，但卻不認為只有南洋風味便已經足夠，而更進一步需要融入台灣（畢竟是在台灣接受文學考驗）或者普世特質，讓一部作品不只蘊含單一地方元素，而是能展現多層次在地實踐，讓不同地區的華文讀者得以接受。

這種多層次在地實踐是台灣文學獎考評馬華作家的重要依據之一，我想透過黎紫書的〈山瘟〉作為第三個個案，梳理這個問題。不同於前述鍾怡雯、辛

金順等馬華作家有豐富的台灣經驗，黎紫書長期居住馬來西亞，未曾留學台灣，她的「在地性」讓她憑藉《告別的年代》一舉代表馬來西亞，榮獲「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的推薦。值得留心的是，儘管黎紫書不算跨國移動作家，她的作品與台灣的連結仍相當深厚。她曾在台灣出版社出版不少小說集，更多次參加台灣兩大報文學獎，共獲得四次大獎⁴³，有別於前幾位是在台馬華作家的代表，黎紫書則是在馬來西亞的馬華作家參與台灣文學獎的代表性個案。接下來，我想討論黎紫書的〈山瘟〉，這篇小說榮獲 2000 年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大獎，該小說在評審會議引發了評審之間的激烈辯論，值得思索馬華文學作品所面對的「普世性」與「獨特性」的辯證。

這篇小說主要講述主角溫義的傳奇故事。溫義是馬共游擊隊的一員大將，他與敘述者「我」的祖上分屬同一游擊隊，因此敘述者對於溫義的認識，均由祖上轉述而來。溫義首次登場，便散發迷離而神秘幽暗的氛圍。

當時年幼，舉頭三尺但見幽靈恍惚，只一隻懸樑蝙蝠朝我一眼。我便信若有輪迴，想必那就是溫義。我祖上每逢酒後述說溫氏平生，總不忘提他在莽林中魑魅般竄越的本事。開場必就在那一大片雨後的橡膠林中。祖上照例背著藥箱，蝸牛般隨疲軍蜿蜒穿越墨綠的暮色。溫義來了溫義來了。是啊，我祖上打一個酒嗝。好個溫義昂藏七尺，從林中豆點燈火閃閃爍爍的深處走來。

就一個人？

對，溫隊長例必獨行

不挑一盞燈？

要燈幹啥，他是妖，山精。有人說一入夜他瞳孔就燒起磷火，你沒見過山貓兩眼，就一個樣綠光慘慘。⁴⁴

⁴³ 包括〈蛆魔〉（1996 年第十八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山瘟〉（2000 年第二十二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大獎）、〈七日食遺〉（2005 年第二十七屆聯合報文學獎·評審獎）、〈我們一起看飯島愛〉（2005 年第二十八屆中國時報文學獎·評審獎）。

⁴⁴ 黎紫書，〈山瘟〉，《聯合報》，2000 年 9 月 26 日，第 37 版。

根據敘述者祖上的描述，溫義英勇神武，機智過人，他彷彿是人，似神，又如山妖精怪。對英軍來說，馬共溫義無疑是瘟疫，令人敬而遠之。然而，由於溫義的故事是透過祖上轉述，如此英勇神武的形象反倒敵人疑竇，讓人懷疑是說故事者加油添醋，喪失此人物的可信度。

祖上搬出童年時坐在橋頭上聽說書那一套。因為不懂節制，言辭動作流於浮誇，每把言之鑿鑿的歷史都說成虛張聲勢的神話。如此畫虎不成，一眾圍坐孩童反倒懷疑溫義此公的真實性…雖我祖上極力掩飾，但故事在重述之間難免出現無法契合的紕漏。⁴⁵

馬共溫義的歷史瞬間淪為哄小孩的野史傳說，不僅祖上的話需大打折扣，敘述者幼時的記憶又如何可供憑證？〈山瘟〉最精采的地方正是激進地質疑語言，質疑歷史，質疑敘述。這樣寫法對應馬共議題是如何的敏感、複雜。馬共在馬來西亞——尤其是華人社群——曾是不可觸的政治禁忌，導致馬共無法在正史檔案現身，只能透過私下轉述，存在於荒誕而離奇的鄉野傳奇。這篇小說在一個故事串著一個故事，一個人轉述前一個人的過程當中，虛實交構裡勾勒出馬共游擊隊在叢林裡影影綽綽的身影。

從以上小說故事概述可知，黎紫書不採取抹除地域性的寫作手法向台灣文學獎叩關，與此同時，〈山瘟〉的馬來西亞風味更甚於辛金順的〈注音〉。整篇小說充滿馬來西亞的地理痕跡，在地色彩鮮明，不只小說設定的場景在四〇年代的馬來西亞的歷史現場，這篇小說更讓英國軍隊、馬來士兵、華人、原住民輪番登場，展現出馬來西亞駁雜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及大馬禁忌的馬共議題，無疑是史書美和王德威所謂的「在地的華語語系文學」。

〈山瘟〉裡鮮明的馬來西亞在地元素在該屆文學獎評審會議引發委員之間的激烈爭議，該屆評審團由李永平、李黎、尉天聰、陳芳明、鄭清文組成。來自馬來西亞沙勞越的李永平率先發難，他認為這篇小說的南洋風味太強烈，「短短幾千字小說，至少要做五十個註」⁴⁶。李永平強調這篇小說的在地特色太鮮

⁴⁵ 同註 44。

⁴⁶ 王立記錄，〈跨越地域性，瞄準時代感：二〇〇〇年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決審會議紀要〉，

明，他解釋道，馬共是無神論者，小說裡的前游擊隊員日後卻轉行當起算命半仙，小說通篇也穿插流年吉凶，無疑是對馬共歷史極大的諷刺。李永平擔憂，外國讀者不見得熟悉馬來西亞共產黨歷史，恐怕難以理解這篇小說的力道所在。

陳芳明和李黎則抱持不同見解，主張這篇小說蘊含普世性。陳芳明認為〈山瘟〉「不是寫馬共，也不是寫主角溫義本身，精彩在敘事者用祖上講的故事建構記憶，重點不在歷史」⁴⁷，而是討論記憶的建構與虛構。李黎也同意這篇小說的精彩之處在於多層次的虛構記憶，她強調小說「儘管背景有隔，但文字鮮活充滿色彩、意象，畫面感跨越地域性，場景栩栩如現眼前」⁴⁸。陳芳明和李黎之所以肯定這篇小說，不是因為這篇小說大膽介入馬共議題，而是源於這篇小說契合當時台灣對於歷史大敘述的反思及質疑。換言之，對於不了解馬來西亞共產黨背景的台灣評審而言，他們仍能從作品裡讀出普遍性。

儘管〈山瘟〉最後仍出線得獎，這篇小說引起評審間的針鋒相對，讓我們更清楚看見馬華文學跨域所面臨的質疑與挑戰：是否具有普世性？文學作品是否承載過多、過於繁複的在地元素？如何於在地獨特性與普遍性之間取得平衡，成為作品是否能成功跨域的關鍵。在地性與普世性的雙面性正體現了我所謂的多層次在地實踐，從李永平的發言可知，〈山瘟〉是一篇深具在地色彩的作品，必須放在馬來西亞歷史脈絡解讀；而從陳芳明和李黎的回應又可發現，〈山瘟〉不只是在地作品，而可展現跨越地域性的潛力。儘管評審的立場各異，但他們分歧的立場一方面說明馬華文學在跨國文學獎認可機制所面對的難題，另一方面也勾勒出華語語系文學作為一種多層次在地實踐的特質。

四、多地共構隱含的創造世界之力

當代華語語系文學研究強調中華文化飄洋過海至異地，經歷一連串在地化、異質化、混雜化的演化，進而讓華語語系文學衍生出與中國文學大相逕庭的文學面貌。在這樣的論述取徑裡，地方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在這篇文章

《聯合報》，2000年9月25日，第37版。

⁴⁷ 同註46。

⁴⁸ 同註46。

透過分析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學獎場域的表現，我企圖指出，地方的影響力雖然不可輕忽，但是將華語語系文學局限為單一地方的文化生產，可能過於簡化。華語語系文學是一種多地共構的文學生產。

我所謂的「多地共構」(places-based production)，意指華語語系文學既是一種「多地共構的書寫」(places-based writing)，也是一種「多地共構的閱讀」(places-based reading)⁴⁹。身處 21 世紀的數位全球村，當跨國移動蔚為常態，無論從書寫者／作品生產者的角度，抑或異地讀者／作品閱讀者的角度，作品的內涵均已無法局限從單一地方的歷史文化加以解讀。以這篇論文所舉的鍾怡雯、黎紫書、辛金順作品來看，作品內涵均已不再是單一地方文化下的產物，而流露跨國文化流動軌跡，讓不同地方之間彼此共構、交會、摩擦。從這個角度，華語語系文學作為一種多地共構的文學，企圖修正目前學界針對華語語系文學的定義——中國文學 vs. 單一在地華語語系文學——，多地共構引領我們思考不同華語語系社群之間的跨文化接觸與協商，不再只糾結中國與華語語系異地之間的辯證角力。儘管在多地共構的華語語系跨國版圖裡，仍不免複製中心 vs. 邊緣的機制⁵⁰，不過，這樣的提案卻具備兩種新意義。首先，中心和邊緣的關係不再是霸權 vs. 抵抗，反而比較接近相互牽連、相互構成⁵¹。其次，多地共構同時也跳脫「位於中心的中國 vs. 位於在地的華語語系」的窠臼，挺向華語語系世界的多向度連結，闢拓嶄新的華語語系世界面貌。

多地共構隱含一股創造世界之力，而且這股力量源自於以往看似邊緣、無力、難以發聲的華語語系地區。世界文學研究這幾年備受關注，謝永平近年來

⁴⁹ 此處主要回應審查人之一的提問。審查人提到「史、王二人的論述乃從書寫者／文本生產者的角度而言，而本文則僅從異地讀者／文本閱讀者的角度論述」，因此有必要釐清「在地書寫」(place-based writing) 和「在地閱讀」(place-based reading) 之間的連接。這是相當關鍵的提問。這裡有兩點回應。首先，本文不只從讀者角度切入。以鍾怡雯的作品來看，她的作品早期強調南洋色彩，後來在台灣文壇或為了打入更大的華文市場進而調整寫作策略，關注普世議題，這便是屬於「書寫者／文本生產者的角度」；其次，史書美、王德威二人的論述也非單從書寫者角度切入，應也包含作品接受的面向。事實上，史、王二人之所以提出「在地生產」(place-based production) 是希望另闢中華文化影響論以外的論述空間，隱含調整論述框架的目的。因此，我和他們的區別並非「在地書寫」和「在地閱讀」的差異，而是單一在地 vs. 多地共構的差別。

⁵⁰ 同註 7，頁 48-50。

⁵¹ 同註 25。

一系列重探世界文學的論文尤其深具啟發。他批評目前世界文學研究的幾位核心研究者包括丹姆洛什（David Damrosch）、莫瑞堤（Franco Moretti）、卡莎諾瓦（Pascale Casanova）等人的研究過於看重作品的跨國翻譯、接受與傳播，進而無法切斷世界文學研究與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緊密連結。謝永平認為，重點不在作品賣出多少國外版權，而是文學作品本身便蘊含著「創造世界的行動實踐」：

我們應該將某一部世界文學的作品視為不同世界化過程的匯集地，各種力量在某一特定歷史場域爭相競奪。如何分析這些複雜的關係，檢視這些過程所衍生出來的對抗與質疑成為當務之急……[世界文學]並非超越時間限制的美學產物，亦非流通全球的商品，而是在繪製環球輿圖及創造世界的過程扮演關鍵角色，一種動量。⁵²

什麼是文學？或，什麼是世界文學？對謝永平來說，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一方面跳脫資本主義出版市場邏輯，另一方面也必須擺脫文學作品僅是一種真實世界的美學再現手法；謝永平主張，世界文學「是在繪製環球輿圖及創造世界的過程扮演關鍵角色，一種動量」，於是乎，世界文學必須是一種可以創造新世界的文學，顛覆我們對於世界現況的認知與想像。謝永平的世界文學論述是站在後殖民文學立場予以發揮，他相信未被認可、不被關注的後殖民文學正可提供充足動能，澈底發揮介入世界文學典律，改造世界的力量。後殖民觀點讓我們放下以歐洲為中心的視角，從殖民地、從屬社群乃至於各種邊緣位置重構世界版圖。

如此說來，華語語系文學隱含何種創造世界之力呢？我認為這可以分成兩種層面來談。首先，從（單一）在地觀點來談，華語語系文學破除中國中心和漢人中心的中原想像，以馬華文學為例，馬華文學裡豐富而獨特的英、日殖民經驗、多元種族緊張關係、跨國遷移、離散經驗、乃至於熱帶雨林風土生態等元素可以引領華語語系地區讀者重新想像華人所身處的世界。這種世界想像雖

⁵² Cheah, Pheng, "World against Globe: Toward a Normative Concep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45, no.3 (2014), p. 326.

強調在地異質性，其本質仍是以大國為比較基礎，依賴某種異於大國的殊異面貌而獲得重視。這種創造世界之力在華語語系前行研究裡已頻頻觸及，張錦忠、E.K. Tan、Alison Groppe、Brian Bernards 的研究皆是顯著例子。

其次，我們也必須從多地共構觀點來思考華語語系文學的創造世界之力，這是以往較少被處理的環節。鍾怡雯〈垂釣睡眠〉抹去地域性，這部作品看見台灣的知識結構與文化偏好影響、左右、介入了馬華文學的生產。同樣的，黎紫書〈山瘟〉以探討歷史、記憶虛妄等普世價值的方式獲得台灣文學獎肯定，反映的也是類似邏輯。辛金順的〈注音〉則提醒我們同一件作品在不同文化脈絡下演繹出截然不同的詮釋，展現多層次在地閱讀的必要。從這篇文章所分析的個案來看，我一方面勾勒跨地方的連結，另一方面，我也嘗試突出地方與地方之間彼此的互涉、改造、相互生成的動態力量。對我來說，馬華文學在台灣文學獎的獲獎分析不僅僅是文學跨國接受的議題，更深刻涉及馬華文學的寫作題材與形式、台灣文學的審美品味、以及台灣文學和馬華文學各自在華語語系文壇的地位等課題，左右我們對於華語語系世界的認知。

換句話說，多地共構觀點關拓出不同華語語系之間的深層連結，這是以往容易遭到忽視的世界縫隙。多地共構所創造出來的世界想像，並非前一種從中國到異質風土、從原鄉到離散、從中心到邊緣的在地化世界，而是強調不同華語語系地區之間的政治、教育、傳媒、市場的緊密聯繫，進而影響各自文化生產的複雜跨文化相逢。簡單來說，除了以大國為參照，關切中國如何改變華語語系世界之外，我們是否有可能想像台灣如何改變香港？新加坡如何改變馬來西亞？香港如何改變北美？而這種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細微改變將更進一步創造一個嶄新的文學世界想像，乃至於世界現實。

參考資料

一、專書

李有成、張錦忠主編，《離散與家國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台北：允晨文化，2010年）。

辛金順，《注音——辛金順詩集》（台北：釀出版，2013年）。

Bernards, Brian, *Writing the South Seas: Imagining the Nanyang i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5).

Chen, Lingchei Letty, *Postcolonial Studies* (2015), DOI: 10.1080/13688790.2015.1050975

Chiang, Howard and Larissa Heinrich eds., *Queer Sinophone Cultures*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13).

Chiang, Howard ed., *Transgender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Groppe, Alison, *Sinophone Malaysian Literature: Not Made in China*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13).

Shih, Shu-mei, *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Shih, Shu-mei, Chien-hsin Tsai, & Brian Bernards eds., *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Tan, E.K., *Rethinking Chineseness: Transnational Sinophone Identities in the Nanyang Literary World* (Amherst: Cambria Press, 2013).

Tsu, Jing & David Der-wei Wang eds.,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Boston: Brill, 2010).

Tsu, Jing, *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Wang, Yiman, "Alter-Centring Sinophone Cinema" in Audrey Yue and Olivia Khoo eds., *Sinophone Cinemas* (New York: Palgrave, 2014).

Zhang, Yingjin ed., *A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6).

二、論文

王德威，〈文學地理與國族想像：台灣的魯迅，南洋的張愛玲〉，《中國現代文學》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11-38。

——，〈根的政治，勢的詩學：華語論述與中國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第 24 期（2013 年 12 月），頁 1-18。

——，〈華夷風起：馬來西亞與華語語系文學〉，《中山人文學報》第 38 期（2015 年 1 月），頁 1-29。

朱崇科，〈再論華語語系（文學）話語〉，《揚子江評論》第 1 期（2014 年 6 月），頁 15-20。

翁弦尉，〈杜撰 Sinophone 的第一人：陳鵬翔教授回想「華語風」〉，《蕉風》第 507 期（2014 年 3 月），頁 39-41。

張錦忠，〈哇賽，那風萬里捲潮來：「華語語系文學論述」專號前言〉，《中山人文學報》第 35 期（2013 年 7 月），頁 vii-ix。

——，〈華語語系文學：一個學科話語的播散與接受〉，《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59-74。

陳榮強，〈華語語系研究：海外華人與離散華人研究之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75-92。

詹閔旭、徐國明，〈當多種華語語系文學相遇：台灣與華語語系世界的糾葛〉，《中外文學》44 卷 1 期（2015 年 3 月），頁 25-62。

趙稀方，〈從後殖民理論到華語語系文學〉，《北方論壇》第 250 期（2015 年 4 月），頁 31-35。

蔡建鑫、高嘉謙，〈多面向的華語語系文學觀察：「關於華語語系文學與文化」專輯〉，《中國現代文學》第 22 期（2012 年 12 月），頁 1-10。

- 魏月萍，〈「誰」在乎「文學公民權」？馬華文學政治身份的論述策略〉，《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第 18 期（2015 年 9 月），頁 81-100。
- 葉金輝，〈文學的國籍、有國籍馬華文學、與「入臺」（前）馬華作家：兼與黃錦樹和張錦忠商榷〉，《中外文學》45 卷 2 期（2016 年 6 月），頁 159-190。
- 黃錦樹，〈關於「真正的馬華文學」——回應葉金輝的商榷（修訂稿）〉，《季風帶》第 2 期（2016 年），頁 78-82。
- Cheah, Pheng, “World against Globe: Toward a Normative Concep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45, no. 3 (2014), pp. 303-329.
- , “What Is a World? On World Literature as World-Making Activity.” *Daedalus*, vol.137, no.3 (2008), pp. 26-38.
- Ng, Lai-Sze and Chee-Lay Tan, “A Study of the Prose of Choong Yee Voon (Zhong Yiwen): A Case of a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in Taiwan,” *Tamkang Review*, vol.46, no.1 (2015), pp. 75-89.
- Shih, Shu-mei, “Forwards: The Sinophone as History and the Sinophone as Theory,”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vol.6, no.1 (2012), pp. 5-7.

三、報紙文章

- 王立記錄，〈跨越地域性，瞄準時代感：二〇〇〇年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決審會議紀要〉，《聯合報》，2000 年 9 月 25 日，第 37 版。
- 吳晟，〈評審意見：語言糾葛〉，《中國時報》，2006 年 11 月 27 日，第 E7 版。
- 辛金順，〈注音〉，《中國時報》，2006 年 11 月 27 日，第 E7 版。
- 陳萬益，〈換隻眼看失眠：簡評〈垂釣睡眠〉〉，《中國時報》，1997 年 10 月 7 日，第 27 版。
- 黎紫書，〈山瘟〉，《聯合報》，2000 年 9 月 26 日，第 37 版。
- 鍾怡雯，〈垂釣睡眠〉，《中國時報》，1997 年 10 月 7 日，第 27 版。

四、電子媒體

王潤華，〈黎紫書《告別的年代》、李憶蒼《遺夢之北》的觀察與思考〉，「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來源：http://novelncf.wenhsun.com.tw/sel_my_review01.html，2016年9月14日）。

林建國，〈理想詩人之路_2〉，《南洋商報》副刊，（來源：http://www.enanyang.my/news/20160830/%E7%90%86%E6%83%B3%E8%AF%97%E4%BA%BA%E4%B9%8B%E8%B7%AF_2%E6%9E%97%E5%BB%BA%E5%9B%BD/，2016年8月30日）。

辛金順，〈在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之間〉，（來源：<http://blog.yam.com/sen/article/45036821>，2016年9月14日）。

曾翊龍，〈馬華文學長篇小說：時空迷亂〉，「小說引力：華文國際互聯平台」，（來源：http://novelncf.wenhsun.com.tw/sel_my_review05.html，2016年9月14日）。

黎紫書訪問、黃錦樹對談，〈寫在家國之外：下〉，《星洲日報》文藝春秋，（來源：<http://life.sinchew.com.my/node/12843?tid=63>，2016年9月14日）。

Dirlik, Arif. "Literary Identity/Cultural Identity: Being Chines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MCLC Resource Center,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s://u.osu.edu/mclc/book-reviews/literary-identity/>, September 19, 2016).